

中国近现代涉关小说研究 (1804—1949)

杨国明 著



上海海关学院学术文库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现代涉关小说研究 (1804—1949)

杨国明 著



上海海关学院学术文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现代涉关小说研究:1804~1949/杨国明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上海海关学院学术文库)

ISBN 978-7-208-15529-9

I. ①中… II. ①杨… III. ①小说研究—中国—
1804—1949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42701 号

责任编辑 赵蔚华

封面设计 张志全

中国近现代涉关小说研究(1804—1949)

杨国明 著

出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5.5

插页 4

字数 195,000

版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5529-9/I·1782

定价 68.00 元

编委会

主 任

干春晖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干春晖 王志军 王丽英 李九领 李红霞 张国红 肖建国
吴宝康 陈 晖 吴 慧 杨寄荣 黄丙志 蒙少东 潘 静

总 序

理论的发展离不开实践的创新,实践创新是理论发展的源泉和动力。随着我国海关事业的改革发展和迅速开拓,海关管理的丰富实践呼唤着海关研究的蓬勃繁荣;同时,海关管理的丰富实践也为海关研究的深层次挖掘创造了深厚条件。

作为海关总署直属的唯一一所海关高等学府,上海海关学院具有海关类学科齐全、基础研究力量雄厚、智力资源集聚的优势。近年来,学院围绕建设成为“立足海关、服务社会、面向国际”的新型智库的目标,积极推动教师深入开展海关理论探索和决策咨询研究。学院以海关学的创建为重点开展基础性研究,紧密跟踪海关实践前沿开展应用研究,积极关注国际海关动态开展比较研究,海关学术研究成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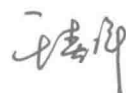
为鼓励学院教师更加积极投身于海关理论的探索和创新,继续推动中国海关学术研究的繁荣和发展,上海海关学院组织编撰了“上海海关学院学术文库”。作为学院新型智库的重要载体之一,“上海海关学院学术文库”重在创建成为海关学术思想成长的园地,为学院教师提供一个发表高水平海关学术研究成果的平台,使这套文库成为国内外读者了解海关研究前沿态势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读物。

文库作者以开放博学的精神来追求科学真理,更以献身海关研究的坚定使命感来追求卓越。文库入选著作一方面紧贴海关改革和发展前沿,从海关管理实践中发现问题,寻求破解之策;另一方面,在对海关实践深入总结和反思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的提炼和升华,充分体现了上海海关学院特有的“爱国明志、开放博学”的文化传统和学术气派。

我们正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对于研究者来说,这无疑是幸运的。而

对于海关研究者而言,处于飞速发展重大历史节点的海关管理实践更为海关理论研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迫切需要大家去发现新问题、寻找新对策、破解新命题,在实践中升华经验和做法,最终形成指导海关实践的科学理论。我们相信,在海关人和关院人的共同努力下,“上海海关学院学术文库”将会越来越精彩。

原上海海关学院副院长



前言

本书取名《中国近现代涉关小说研究》(1804—1949),意在将自 1804 年(《蜃楼志》刊印)至 1949 年间的小说中涉及海关题材的内容予以梳理,加以整体研究,采取文史互证的方式,勾勒出近现代小说中的海关图景,从小说世界来烛照近代海关,也从海关的视角来考察小说,从而为近代海关及近现代小说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从小说之认识作用的发挥来看,其比海关史料更为生动形象,我们也可以从中发现近现代作家尤其是读者们对海关关注的重点之所在,还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弥补史料之不足。而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却是衡量艺术真实程度的一把标尺,从这个角度来说,又可以历史真实来评判涉关小说反映的广度与深度,正如韦勒克、沃伦说的:“社会科学的现有知识,构成了据以检验小说家的‘世界’(即虚构的现实)的‘真理’。”^①

本书的写作,系填补近代海关史及近现代小说史在这一领域的空白。虽有文章对本书所涉小说加以研究,但几乎没有人从“涉关”专题的角度予以发掘。迄今为止,主要有本人完成的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课题《晚清小说与近代海关的变迁》(2001 年),发表的《晚清小说与海关制度初探》、《〈蜃楼志〉海关史料考辨》^②等论文,以及出版的专著《晚清小说与社会经济转型》^③之第四章“晚清小说与海关制度的演变”。但上述文章从所涉时间上看仅晚清时段,远没有涵盖近代内容。从内容上看,就所写的部分

① [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1 页。

② 见《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3 期及《学术探索》2017 年第 9 期。

③ 杨国明:《晚清小说与社会经济转型》,东方出版中心 2005 年版。

也过于单薄,远不能涵盖晚清小说中丰富的海关图景。而且,随着研究的持续,部分观点也需要进一步深化,遂重新梳理相关资料,并将视线延至1949年近代海关彻底终结之时,以专著的形式来呈现近现代小说丰富的“涉关”内容。

这里提出了“涉关小说”概念,准确地说是“涉海关小说”,或“涉税关小说”,而不是“涉关隘小说”、“涉关卡小说”。这里的“海关”内涵包括近代海关所涉及的常关、洋关及相关的厘金税卡等。作如是研究,主要是由近现代海关的特殊性决定的,也有学理上的依据。“涉某某文学研究”在学界早已有之,其实质是跨学科研究,按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这属于文学的“外部研究”^①。这种研究在学界非但正方兴未艾,甚至还被提倡、鼓励。当然这一概念的提出及这一选题的产生,自然也与我在上海海关学院任职有关。

近代海关的特殊性集中体现在由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等导致由洋人主政的外籍税务司制度的建立。这一制度自1854年始,至1949年止,长达96年,几与近代史相始终。由洋人主政的海关拥有超级职能,一度对近代的教育、邮政、港务、船政、外交、军事、债赔等产生重大影响。关税自主权、洋关行政管理权及辛亥革命后的关税收支权等海关主权的相继旁落,使得政府不能自主制定关税政策,民族工商业不能得到保护,最终使得中国商民不仅遭受惨重的经济损失,还在自己的国土上遭受外人甚至海关洋员的歧视甚至凌辱。而这一切又给近代中国商民带来无与伦比的精神痛苦。这种屈辱感,痛苦、愤懑的情绪,以及对主权独立及美好生活的向往,一般不大为历史所关注,而这恰恰是小说的强项。当然小说也会关注历史进程本身。

这一课题研究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近现代小说中有着丰富的海

^① 参见[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第三部“文学的外部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关生活书写。需要说明的是,“近代海关”中所对应的“近代”是个史学概念,一般是从1840年至1949年,而文学的“近代”概念是一般指1840年至1917年。近代以甲午战争及辛亥革为界点而分成三个部分。1917年至1949年,是为现代文学^①。纵观近现代的历史,再比照涉关小说,也可以看出后者在整个小说史上的分量。而本书的写作从1804年开始,因为在笔者看来,第一部广泛涉及清代海关生活的《蜃楼志》初刊于这一年,它被称为开晚清谴责小说的先声^②。实际上,自1804年至19世纪末,像这样有分量的涉关小说似仅此一部。涉关小说集中涌现于辛丑条约签订后的20世纪初,在旨在救亡图存而将小说实用功能几乎放大到极致的“小说界革命”后,产生了大量以“碎片化形式”为主书写海关生活的涉关小说。这些小说主要包括《中外三百年之大舞台》、《中外通商始末记演义》、《林文忠公中西战纪》、《羊石园演义》、《万国演义》、《通商原委演义》、《误中误》、《医界镜》、《痴人说梦记》、《新汉口》、《东京梦》、《苦社会》、《苦学生》、《宦海潮》、《檀香山华人受虐记》、《邹谈一曝》、《新水浒》、《新三国志》、《新三国》、《宪之魂》、《尚父商战记》、《新中国》、《新中国未来记》、《文明小史》、《新乾坤》、《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廿载繁华梦》、《官场现形记》、《黑籍冤魂》、《黑狱》、《小学生旅行》、《神州光复志演义》、《负曝闲谈》、《眼前报》、《中国现在记》、《优孟衣冠传》、《最近官场秘密史》、《无耻奴》等。民国初年至五四间,新小说的创作陷入低潮。主要是鸳鸯蝴蝶派、黑幕小说等。这时也产生了涉及收复青岛(含青岛海关)的《战地莺花录》等作品。经过新文化运动,在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里,“五四”小说取得了文学的正宗地位,从“问题小说”到人生派写实小说,更有市民通俗小说的畅行。其中出现了包天笑的《上海春秋》、《金粉世家》(与张恨水的《金粉世家》同名)等作品。第二个十年中,文学主潮随着整个社会的变革

① 参见钱理群等主编:《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分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② 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1294页。

而变得空前的政治化,有左翼小说、京派小说、海派小说等流派。而我们在《子夜》、《春蚕》、《一千八百担》、《无忧花》、《到大连去》、《红牡丹》、《死水微澜》、《多收了三五斗》、《到镇溪去》等小说中读到了涉关元素。第三个十年中,战时的国家分裂为三个地区,这种社会背景很深地影响了文学,形成了国统区的讽刺和追忆小说、沦陷区的洋场通俗先锋混合型小说、解放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新型小说,构成各有特色的局面^①。我们在林语堂《京华烟云》,张恨水《八十一梦》、《牛马走》,茅盾《锻炼》,钱锺书《围城》等小说中读到了抗战背景下的涉关叙事。毫无疑问,本书所梳理的涉关内容,不可能穷尽所有的近现代涉关书写,不过是择其要者以力求无“重大遗漏”以反映其本质而已。

虽然并无一部全部以海关生活为描述对象的小说,以“碎片化形式”为主书写海关生活的作品却数量众多,本书所涉及的小说直接引用的八十余部(篇),直接加间接涉及近百部(篇)。这些涉关小说按其所涉海关生活的广度来看,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广泛涉及海关生活的,涉关人物贯穿小说的始终,如《蜃楼志》、《廿载繁华梦》等。二是集中若干章表现海关生活的,如《京华烟云》第四十一、四十二章,比较集中地描绘了抗战前津海关缉私队员对日韩走私分子的艰难缉私行为。三是对海关生活作碎片的反映的。大部分涉关小说均属此类。

上述涉关小说,就其内容而言,它展现了近代海关图景涉及近代海关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对海关二元制度格局的再现,不仅涉及制度的产生过程也即近代海关诸多主权的旁落过程,还叙写了其产生的多方面的负面影响以及主权恢复的曲折历程,尤其是多角度抒写了国人痛苦、愤懑、向往恢复关税主权的情绪心理。有对海关业务含正常业务及各类代办业务的反映,有对走私缉私的书写,有对海关腐败及反腐败的叙述。更有由海

^① 钱理群等主编:《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3页。

关监督、华洋关员及关属组成的丰富的海关人物画廊。而就艺术水准而言,几乎每个时期都有一流作家参与了对涉关生活的书写。

我们认为涉关小说至少具有四种价值:首先,它像其他文学作品一样“可以被历史家当作一种社会文献来使用”,也即具有独特的社会认识意义。第二,涉关小说还具有特定的劝惩功能。在涉关小说中我们会读到部分海关贪腐官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处,也可以读到小说世界中的大部分“坏人”都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但作者的谴责、鞭挞之情,忧世爱民之情溢于言表,通过文学作品特有的感染力而对读者产生相应的影响则在情理之中。第三,涉关小说还有其特有的审美功能。这是由小说作为文学艺术之一门类所独有的审美性决定的。最后,我们阅读涉关小说,还有一种特别的价值。作家所关注的重点,往往也是读者所关注的重点,而作家与读者所关注的重点也可看作是民众的关注重点。可以说,涉关小说揭示了民众对近代海关关注重点之所在,体现出一种独特的民众视角。而这是一种超越普通海关史料的独特价值。而这些,也正是本书所努力发掘并呈现给读者的。

本书主体部分共6章,与前言及余论相结合,形成“前言(涉关小说导论)——第一章至第四章(涉关小说主题、情节)——第五章、第六章(涉关人物形象塑造)——余论(涉关小说的艺术成就等)”的粗线条的小说研究体例。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常关与洋关：二元格局	
——近现代涉关小说中的海关制度再现	1
第一节 《蜃楼志》海关制度之史料考辨	2
第二节 《廿载繁华梦》与清末海关制度	16
第三节 涉关小说与外籍税务司制度	23
第二章 旁落、追忆与抗争	
——近现代涉关小说中的海关主权书写	45
第一节 早期海关主权特征	46
第二节 海关主权旁落的过程及其影响	55
第三节 “恢复关税主权”的艺术想象及行动	83
第三章 水客走水与国门卫士	
——近现代涉关小说中的走私缉私图景	99
第一节 涉关小说中清代中晚期的走私及缉私	99
第二节 涉关小说中民初至抗战前夕的走私及 缉私	110
第三节 涉关小说中抗战及以后的走私与缉私	124
第四章 上下其手与法网恢恢	
——近现代涉关小说中的海关腐败与反腐败叙事	132
第一节 涉关小说中的常关腐败	132
第二节 涉关小说中的常关反腐败	154
第三节 涉关小说中的洋关腐败与反腐败	161

第五章	海关监督谱系	
	——近现代涉关人物形象(上)	164
第一节	涉关小说中的粤海关监督形象	165
第二节	涉关小说中的天津及上海等地关道形象	175
第三节	吴继之:涉关小说中难得的“正面”关卡负责人形象	190
第六章	关员与关属群像	
	——近现代涉关人物形象(下)	193
第一节	常关中的关员(吏)形象	193
第二节	涉关小说中的洋关华员形象	210
第三节	涉关小说中的关属形象	213
第四节	“阿瑄”——难得一见的税专毕业生形象	223
余论		
	——中国近现代涉关小说反映的“得与失”	226
参考文献		230
后记		236

第一章

常关与洋关：二元格局

——近现代涉关小说中的海关制度再现

中国海关史上第一次正式以“海关”来命名机构，始于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1684—1685年）的闽海关、粤海关、浙海关、江海关的设立。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限定广州一口为外国商船进出港口，四关仅存粤海关。粤海关之重要性不言而喻。西方列强以鸦片战争为起点，通过中英《江宁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及其附约获得了片面协定税则的权力，又利用1854年上海小刀会起义夺取了江海关行政管理权，接着又在1858年10月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规定清廷要“邀请”外国人“帮办”税务，从而使中国海关逐步丧失了独立性，并最终建立起了外籍税务司制度^①。而在这一制度建立的同时，沿海、沿江及水陆要冲的内地并没有撤废传统的管理中国帆船及其货物的户关、钞关，在个别口岸如天津及上海、广州等地还出现“一地两关”的特殊状况。而20世纪初年随着外国侵略的加深，不平等条约又使得海关进一步扩张，辛丑条约使得海关兼并五十里内常关，职能扩展至管理国内帆船贸易。自辛丑条约后，海关税率及税则的修订，也和裁

^① 清代的海关与现代的差别甚大，就财税职能而言，它是一个收支一体的机构，也就是说，它是集后世税务、财政为一体的国家机构。其职能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估税、关税收纳、税款保管、税款分配。税务司承担了原本由海关监督的第一个职能——估税，并牢牢掌控了那些新增职能，如港务管理、经济情报分析，甚至还有外交等。也就是说，晚清的海关是一种特殊的二元体制：税务司直接和外国商人交涉，确定应缴税额，并管理港务、分析经济情报等，海关监督负责与财政更为直接的职能。参见任智勇：《晚清海关再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7页。

撤厘金^①、税卡关联在一起。而近代海关,俗称洋关或新关(在晚清小说中时有“洋关”的名称出现;为方便起见,后文一律称之为“洋关”),原有的户关和钞关往往被称为旧关、老关(1914年以后统称常关;后文一律称之为“常关”)。由此,“洋关”与“常关”并存,形成所谓的“二元格局”。

而从近现代小说史来看,有着丰富的海关制度书写,形象地再现了传统海关特别是清中期粤海关的制度特征、清末海关制度尤其是书吏制度的主要特点及外籍税务司制度的诸种特殊性,独特地揭示了民众对海关制度的关注视角。

第一节 《蜃楼志》海关制度之史料考辨

题“庾岭劳人说”、“禺山老人编”的小说《蜃楼志》,初刊于嘉庆九年(1804年),二十四回,是第一部广泛涉及海关生活的长篇小说。小说从粤海关监督赫广大敲诈行商、贪污中饱、生活腐化到官场倾轧,从十三行商总苏万魁被迫退出洋行到其子焚券市义、流连风月,从贸易兴盛到官逼民反,通过广阔的生活画面,反映了清乾嘉时期岭南地区商业生活和官场腐败以及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在这些最能触动普通人神经的海关生活中,保存了大量为一般海关史籍所不太重视的制度史料。小说毕竟是虚构的产物,就不能不对之进行“辨释”,以发掘其史料价值并进而确定其相

^① 这是清廷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过程中,为筹集军费而开征的一种值百抽一的商业税。百分之一为一厘,故曰厘金。起征年为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当时清廷为防堵太平军再进,由各省调集大军,屯驻大江南北,为数不下数十万人,需饷既多,而当时财政和困难情形自然断难充分接济。时“副都御史雷以誠以刑部侍郎在扬州帮办军务,兼保东路。因为练勇需饷,奏请于里下河设局劝捐(三年夏间)。他用的劝捐方法,与以前稍有不同,即预请户部颁发部照千余纸,随捐随给执照,不如以前之迟报给奖,故其成绩较他处为佳。但雷氏以为劝捐实非久长之计,及从幕客钱江之议,采用一类似捐输而又能施行较久之法,此即捐厘之法”。见罗玉东著:《中国厘金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7页。

应的文学认识意义,重新认识这部小说在涉关文学史乃至海关史方面的独特价值。

一、《蜃楼志》与清中期海关行政、税收制度辨释

先考察一下《蜃楼志》所写海关生活对应的历史时期。文中标明是明嘉靖年间,这当然是规避现实的假托,因为文中所书写的海关是在康熙二十三年之后才出现。本书初刊于1804年,书中有个人物名叫摩刺,系白莲“余孽”,而白莲教起义时间为1795年至1804年。不难发现小说所对应的历史就是1800年前后,也就是乾隆后期及嘉庆初年。揆诸史书,小说基本再现了彼时海关行政体系及税收的情况。

首先,从小说中海关监督及分关的设置情况来看,小说基本再现了清中期海关的行政体系状况。清粤海关除设有监督外,还有属官“笔贴式”。笔贴式为满语译音,意为“写字人”,即书办,有实权,类似副监督。粤海关建关初年,关务由两广总督兼管,后改为专任,多为满人担任,不用听督抚节制,直接向皇帝和户部负责。其后虽由督抚或将军兼任与专任有所反复,但自乾隆十五年(1750年)后基本都是由专任监督管理^①。《蜃楼志》中粤海关监督系专任,督抚另有其人。赫广大系工部侍郎的女婿,“督抚三司都不放在眼里”(第一回),然并没有出现“笔贴式”。监督任期一般为三年,但亦有短仅一年或长达十余年的。其办事人员主要有两类,即监督带来的家人、亲信(称委员)及地方推荐的书吏(税吏)、巡役等。《蜃楼志》中赫广大带包进才等众多家人一起赴任。他诸事多与包进才商量。粤海关下辖省城大关等7个总关口,乾隆八年(1743年),粤海关“通关口岸大小共43处”,至道光年间已达70多处^②。而《蜃楼志》第七回中也再现了各分关之多的实况:“话说那惠州八口,乃是乌墩、甲子、油尾、神泉、碣石、

① 韦庆远、叶显恩主编:《清代全史》(第五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页。

② 韦庆远、叶显恩主编:《清代全史》(第五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9页。

靖海、浅澳、墩头,各口设立书办,征收货税。”

提到粤海关行政体系,就不能不提兼有商务和外交双重性质的半官方组织的“十三行”。粤海关设立后,即将外贸和内贸分开管理,经营内贸者称“本港行”,经营外贸的为“十三行”,系从明代“牙行”演变而来。行商一方面垄断贸易具体业务,并向海关保证交纳税款,另一方面又代表政府和海关约束外商活动。“公行”成立于1720年12月(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最初有广州16家洋行组成,但时立时废,直到1782年公行制度才最后确立下来。小说中描述道:“广东洋行生理在太平门外,一切货物都是鬼子船载来,听凭行家报税,发卖三江两湖及各省客商,是粤中绝大的生意。”(第一回)这里的“鬼子”显指“外商”,而“行家”是指十三行的行商。行商有权代表海关对外商进行征税,“鬼子船”所载货物都主动向“行家”报税,显示了十三行的半官方性质。

关于十三行的数目。小说第二回在揭露粤海关监督赫广大的敲诈勒索给洋行带来的灾难性影响时说:“十三洋行只剩七。”根据《十三行考》中说,行商原为承保税饷而设。税饷有定额,故行商亦有定额。乾隆三年(1738年),行商之数十一;四十四年(1779年),八;四十六年(1781年),四;四十七年(1782年),复增至九。是时,公行团结益坚不可拔。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行商多困,行数减至五,次年(1792年),复增至十二。嘉庆十八年(1813年),共有十家^①。小说中写洋行由十三家减至七家,而1781年时为四家,1791年时为5家,1813年为十家,可见洋行数总体符合1800年前后的史实。

再次,《蜑楼志》中所涉及的粤海关关税问题。先说一下小说中涉及的“包税制”。清代关税征收的方式基本采取“包税制”。《广东十三行考》中说,行商原为承保税饷而设。税饷有定额,故行商亦有定额,此种“官

^①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8页。